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女性身份构建研究

周 蓉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的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试图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为生活在困境中的少数族裔女性群体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范式。在解构女性传统身份、思索女性新身份构建的途径、和展望未来的过程中, 希斯内罗斯借用一个小女孩的精神领悟来引领广大女性同胞勇敢地从现在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做自己真正的主人。

[关键词] 希斯内罗斯; 女性身份; 《芒果街上的小屋》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2-0132-04

A Study of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 House on the Mango Street

ZHOU 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

Abstract: A House on the Mango Street,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Mexican - American woman writer, Sandra Cisneros, attempts to offer an ideal sociopolitical paradigm for the minority women in sad straits from a uniqu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rough d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female identity, exploring a new female identit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ith the help of a little girl's spiritual experience, Cisneros intends to help all women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estraints and to be the real masters of themselves.

Key words: Cisneros; male identity; house on the Mango Street

荷兰比较文学学者莱恩·T. 赛格尔斯曾说过:“在当今这个时代, 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充分而均衡的洞察, 意义重大。”^[1]文化身份的解构、建构和认同历来是困扰少数族裔美国人的一个历史性的集体经历。20 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对于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身份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 美国社会和文学界涌现出了一批少数族裔女作家, 她们站在各自族裔和性别的立场, 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并积极去探寻自己族裔的身份构建和生存出路问题, 同时也成功推动了主流女性主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杰出代表有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等人, 而桑德拉

·希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则是墨西哥裔女作家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希斯内罗斯 1954 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贫穷的家庭, 父母均是墨西哥移民。排行老三的她是家中七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希斯内罗斯从小跟随父母在墨西哥和芝加哥两地之间来回迁居, 因此她的童年生活一直动荡漂泊, 穷困艰难。希斯内罗斯后来回忆起这段窘迫苦难的经历时说到:“因为我们总频繁地搬家, 而且总住在那些看起来像二战后的法国那样的街区里——街区破落, 建筑物残败, 像被烧过一样, 所以我心里想退避到别处去。”^[2]¹³⁸居无定所的生活和墨西哥裔移民的尴尬身份使得她从小就很难结交到真正知心的朋友, 她逐渐变得内向害羞起来。在她窘迫而孤独的童年,

收稿日期: 2011-10-17

作者简介: 周 蓉(1982-), 女, 湖南永州人, 硕士研究生,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

她渐渐地与书籍为伴,爱上了阅读与观察。她洞察生活中的一切令她感兴趣的人和事,并把自己的观察和感受记录下来。进入高中以后,有位老师发现了希斯内罗斯的写作天赋,并把她的作品在全班宣读,这大大增强了希斯内罗斯的信心。但是她真正的写作生涯始于她的大学时期。她大学毕业以后被推荐就读于著名的写作培训班—爱荷华大学研究生写作班。当时她是班里唯一的拉美裔学生。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使得她的写作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她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一个来自工人阶层,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独立的声音。^{[2]139}这种自主意识和她独有的个人经历使得她开始着手《芒果街上的小屋》(A House on the Mango Street)的创作。30岁时希斯内罗斯凭借《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举成名。在《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创作中,希斯内罗斯将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跟少数族裔视角带入了文化诉求,在作品中积极地探讨了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尤其是墨西哥裔女性的困境和出路。

《芒果街上的小屋》出版于1984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该书在美国销量达到500万本,并被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被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竞相阅读。1985年该书更是荣获美国图书奖,并很快被收入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此后又进入美国大中小学课堂,作为修习阅读和写作的必读书被广泛使用,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小说经典。希斯内罗斯用日记的形式,用诗般的语言记录了一个少女的精神成长。该书讲述了居住在芝加哥的一位贫穷的墨西哥裔少女——埃斯佩朗莎的成长故事。埃斯佩朗莎,在西班牙语中代表着希望的意思。这样一个普通的少女用自己清澈的双眼关注着周围的世界,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讲述自己成长的烦恼,倾诉青春的梦想与渴望。而埃斯佩朗莎的故事实际上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作为墨西哥裔移民的后代,她书写的是自己曾经居住的移民社区。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她取得了成功,逃离了芒果街的阴影,但是她也试图帮助自己的族群,尤其是广大女性同胞找到真正的自我,改善自我生存的空间,构建少数族裔女性的理想社会身份。

一 传统身份的解构

在小说中,希斯内罗斯借助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视角塑造了多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包括埃斯佩朗莎的母亲、姨妈、曾祖母、邻居萨莉跟玛琳等等。这

些女性形象虽然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但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女性在墨西哥裔族群中都不具有独立的自我和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她们仅仅是别人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3]274}她们身上所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她们都是传统男性中心主义者的附属品。

埃斯佩朗莎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用自己无私的爱为自己的儿女们建筑了温馨的家。在埃斯佩朗莎的眼里,妈妈是美丽、善良、甜美的化身,有着圣母般的美貌和品德。她有着如圣母般美丽的卷发,身上散发出甜甜的面包香是每个孩子美梦的开始和依恋的港湾。她的母亲原本天资聪颖,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和领悟力,她告诉埃斯佩朗莎:“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的,你知道么?”^{[4]123}“她会两种语言。她会唱歌剧。她知道怎么修理电视机。”^{[4]123}然而面对强大的父权制传统,她早早嫁作他人妇,为家庭无私地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才华。她良好的艺术天赋用到了家务活上,到最后她连坐哪条地铁线路去市中心都不知道。埃斯佩朗莎的姨妈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身患重症的她因为无法履行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务,居然一直盼望着死神的到来。因为面对她的丈夫跟儿女,她经常无名地感到“羞愧”和“不安”。殊不知,她弱小的身躯承载了顺服、牺牲、屈服等被父权制社会所认可并推崇的女性标签。“姨妈如同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当失去价值,便丧失了生存的意义。”^{[5]26}更为可悲的是,同时,姨妈自己也深深认同并屈服于这样的命运。透过埃斯佩朗莎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份的卑微跟男权文化的冷酷。

母亲跟姨妈贤妻良母的形象让埃斯佩朗莎深刻意识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而她身边年轻女性的命运更让她体会到了女性身份在父权制社会下的艰难处境。来自波多黎各,等待别人来帮她改变命运的女孩玛琳,期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拥有自己的大房子。她一人孤身寄居在姨妈家中。因为得不到姨妈一家的很好照顾,她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丈夫,离开芒果街,从此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对她而言,她达成愿望的唯一途径就是打扮自己,吸引有钱男人的注意。她“在等一辆小汽车停下来,等着一颗星星坠落,等一个人改变她的生活”。^{[4]33}她的言行举止背离了传统的女性形象,在芒果街的居民眼里,玛琳成为了一个不安分守己、不守贞洁的坏女孩。最终被姨妈嫌弃而遣送回国。而同样天生丽质、喜欢打扮的女孩萨莉,因为她的美丽在父亲的眼里是个大麻烦。他认

为“她随时都有可能勾引异性或者被异性勾引,这对他作为男性家长的权威和尊严都是严重的损害。”^{[5]27}因此他不准女儿外出,不准参加舞会。一旦发现女儿跟异性说话,就会“像揍一条狗一样用手揍她”^{[4]125}。在无奈嫁给一个推销员后,她的处境并没有由此得到改善。同样是因为她的美貌,丈夫把她锁在家里,不得与外界接触。萨莉从父亲的束缚跳到了丈夫的控制中。无论是玛琳还是萨莉在姨妈或者父亲、丈夫的眼里都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也曾试图跟命运作斗争,挣脱自己被设定的身份。相比埃斯佩朗莎的母亲和姨妈,她们身上体现了一定的女性觉悟和反抗意识。但是她们都把解脱的希望寄予在了婚姻和丈夫身上,殊不知完全依赖丈夫的婚姻是她们身份的另外一层枷锁。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身份被定义为人妻人母,把女性局限在狭小的家庭生活中,并使女性沦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主体性价值,完全依附男性需求而存在的躯壳。传统女性形象本来就是男权社会及男权文化为女性设定的无形的枷锁。在小说中,无论是母辈贤妻良母的形象还是尚有一丝反抗意识的新女性形象都与生活的枯燥、女性的无助、精神的匮乏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希斯内罗丝试图解构传统女性身份的意图显而易见。解构传统女性身份的目的是为了给广大困境中女性创造一线生机,作者通过生动展现所有有关女性的凄凉意象,让埃斯佩朗莎获得了获益终身的教诲和领悟。

二 新身份的构建

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里写的:“被男人歌颂的理想女性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者她们自己的舒适,或者自我愿望,即她们的行为都是向男性奉献或者牺牲,而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6]原有身份的桎梏使年幼的埃斯佩朗莎开始思索自己的出路。面对这样一个男性主导一切的世界,埃斯佩朗莎开始了自己的抗争。母亲、姨妈以及周围同性的悲惨遭遇也让她得到了更多的启示。她不愿像自己的母亲和姨妈一样做一辈子的贤妻良母,也不愿像玛琳和萨莉那样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吸引男人的注意。姨妈虽然生不如死,但她却一直鼓励埃斯佩朗莎,“你一定要写下去,那能带给你自由”。^{[3]80}而母亲虽然一辈子都成了别人的贤妻良母,她却并不希望女儿重复自己的老路,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艺术的向往,保留

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她鼓励女儿努力学习,接受教育,靠知识去改变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做一个真正独立的女性。埃斯佩朗莎渴望拥有跟男性平等的地位,她说“我是那个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的人,不把椅子摆正过来,也不拾起碗筷来”。^{[3]120}这样的宣言说出了她的心声:她不愿像母亲那样成为一个深陷家庭琐事的贤妻良母,也绝不会像玛琳萨莉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婚姻和丈夫身上。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女性原来的身份束缚。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母亲姨妈的教诲,使埃斯佩朗莎心中越来越明确了自己所追求的,即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3]14}因此,在埃斯佩朗莎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玛琳、萨莉那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性身影,也有着母亲和姨妈形象的痕迹。她的形象建构了一个不依附于男权,具有独立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女性身份。而这所属于自己的房子被赋予了深刻的精神隐喻。这是一个象征女性独立和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新空间。在这里埃斯佩朗莎所期望的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希斯内罗丝建构全新女性身份的一个深刻的隐喻。她试图告诉广大的女性,只有依靠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身份,才能摆脱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挣扎和无奈。而希斯内罗丝的这一隐喻也回应了维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里的观点。伍尔夫指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7]拥有自己的房子不仅仅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摆脱作为男性附属品标签的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房子也是女性追求自由、拥有自主的精神象征空间。年幼的埃斯佩朗莎深刻地领悟到其中的意义。不仅如此,她甚至开始思索自己名字的意义,她想要给自己取名“取一个新的名字,它更像真正的我,那个没人看到过的我”。^{[4]11}显然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名字,它更像是一个符号。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说过,“废弃名称和自我命名的行为是确立文化身份和申张自我的必要手段”^{[5]28}这是埃斯佩朗莎对传统女性身份的背叛,也是埃斯佩朗莎确立起独立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证明。小说中,埃斯佩朗莎带着墨西哥苦难女性的期望,走出芒果树小街,决定用自己的努力来开辟出一番女性生存的新空间,即通过写作,来为更多的还身处男权制社会控制下的女性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埃斯佩朗莎个体身份的自我构建也为身后的广大弱势女性群体提供

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范式。

三 对未来的展望

埃斯佩朗莎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女性觉悟的女孩,已经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同时也通过个体身份的自我建构为少数族裔的美国女性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女性身份,即独立自主、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新女性形象。而这个要拥有属于自己房子的梦想也是所有成千上万居住在芒果街或不居住在芒果街上的女性所共同追寻的目标。这座小屋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生存空间,也是以埃斯佩朗莎为代表的女性同胞们精神独立的起点和女性心灵栖息的空间。^{[8]52}同时,对于那些还没有离开,或者将要离开的人,作者希斯内罗丝给予了同样的精神关怀,“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我不会忘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路过的流浪者会问,我可以进来吗?我会把他们领上阁楼,请他们住下来,因为我知道没有房子的滋味。”^{[4]118}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埃斯佩朗莎谋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所有芒果街困境中的人的救赎:“我离开,为的是回来。为了那些留在我身后的人。为了那些走不出芒果街的人。”^{[4]150}而这也是希斯内罗丝对于整个民族的关怀和思索。她本人凭借小说创作,成功地走出了曾经桎梏她母辈的那条“芒果街”,实现了个人的理想,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成功树立了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的新形象,为千千万万的马琳和萨莉提供了一条正确的出路。但是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族裔身份,她承诺为了那些“留在身后的人,和那些走不出芒果街的人”再回来。而希斯内罗丝也常以“奇卡纳女性主义者”自居,奇卡纳即美国墨西哥裔女性。希斯内罗丝拒绝牺牲自己的族裔身份来融入主流社会,而是努力地去宣扬自己的本族文化。她也曾经说到,“我觉得我的族群,还有我的性别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有许许多多的不公正等着我去关注。我可以帮助其他女性找到另外的生活出路,让这样的变化成为现实”。^{[9]18}在这里,她通过埃斯佩朗莎而建构的全新女性形象为自己的信念做了最好的注脚。同时这个全新的女性新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其个体身份的构建也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使命感,即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更多还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希斯内罗丝将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寄予在生活 在芒果街的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身上,通过她的视角来剖析女性的原有身份的束缚和不平等,并通过她的精神领悟和探索构建了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移民的新身份。而作为在主流文化中最活跃,在经济上最早取得成功的墨西哥裔女作家,希斯内罗丝也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9]18}她视本族裔同胞,尤其是女性同胞命运的改变为己任,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她曾说到:“我可以帮助其他女性找到另外的生活出路,让这样的变化成为现实。我能借助创作做到这些,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9]18}因此,希斯内罗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她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墨西哥裔女性移民构建了一个新的身份,同时还指引着千千万万渴望从男权社会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同胞走出去,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自己的主人。

参考文献:

- [1] 莱恩·T.赛格尔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化研究的新视角[C]//乐黛云,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5.
- [2] 沈 磊.家·回忆·梦想—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其人及作品《芒果街上的小屋》[J].山东文学,2009(9):130-142.
- [3] 李道全.逃离与复归:《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移民社区书写[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273-277.
- [4]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芒果街上的小屋[M].潘 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5] 石平萍.开辟女性生存的新空间—析桑德拉·西斯内罗斯的《芒果街的房子》[J].外国文学,2005(3):25-29.
- [6]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47.
- [7]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 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
- [8] 吕 娜,王冰莹.梦想的起点和归宿—浅析《芒果街的小屋》中小屋的意象[J].作家杂志,2008(9):51-52.
- [9] 石平萍.“奇卡纳女性主义者”、作家桑德拉·西斯内罗斯[J].外国文学,2005(3):16-18.

责任编辑:李 珂